

辛弃疾信州词:地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诗意书写

朱长英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人地关系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宋词研究亦不例外。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弹劾罢官,退居江西信州长达二十年之久,这一退居地选择是一个人生选择,更是一个文化选择。辛弃疾以寻找精神故乡为始选择信州定居,融入信州本土文化圈后,又以词为媒介以信州为圆心向周边泉州、婺州以及整个豫章文人圈辐射,形成了地域文化交流的动态景观,进而影响形成了稼轩词融合南北刚柔并济的多样化风格。以信州退居地选择为切入点,还原以词唱和交游的历史文化现场,辛弃疾词风多样性就有了基于地理空间转移的地域文化意蕴,是特定时空下南北地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诗意书写。

关键词:人地关系;辛弃疾;信州词;地域文化交流;诗意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6)04-0089-07

收稿日期: 2026-05-10

作者简介:朱长英(1975-),女,山东乐陵人,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4.011

在人地关系的广阔视域下,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生动而辩证的,一方面地域文化会对文学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创作者及其作品又会对地域文化发生作用,这种互动使得人地关系变得生动而复杂,往往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动态平衡。一般而言,创作者在某地居住时间越长受该地地域文化的影响就会越深远,与此同时,创作者对该地的影响程度也在持续性加深。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生于山东济南,绍兴三十二年(1162)离开山东奉表南归,抗金复土的理想事业在南归后的十余年内屡遭阻厄。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被弹劾罢官,退居江西信州前后达二十年之久。作为两宋一代之文学,词这一文学样式在辛弃疾笔下成为“陶写之具”^①,慷慨悲歌、抑郁不平之气都寄之于词。据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辛弃疾存词626首,为两宋词人之冠,信州酬赠词有220首之多,在292首酬赠词中占比已超75%,这从侧面印证了文学和地域文化间存在动态辩证关系的基本论断。在人地关系这一理论背景下,辛弃疾的信州词及其地域文化意蕴尤为值得关注,这对拓展两宋词人研究路径及视野,深化文学与地域文化互动关系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寻找精神故乡

辛弃疾在山东济南生活了22年,齐鲁大地的山水自然和人文习俗已融入他的心灵和血脉,铸造了他的文人品格,即便寓居长江以南的江西信州,其文学创作仍带有齐鲁文化的地域印记。

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为信州上饶新居作《新居上梁文》:“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人生孰若安居之乐?”^②“宅”,一般指住所,即地上建筑物,与山川湖泊等自然地理环境关系密切;“邻”,一般指邻居,与乡邻风俗等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不难见出,辛弃疾选择信州作为退居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在其考量范围,考量标准自然绕不过他的齐鲁文化基因。

宋时信州属江南路,“地僻山深,尚带瓯闽之俗;民贫赋重,偶连上浙之区”,“郡分江左,乃士俗之素贫;地近日边,幸政声之易达”^③。信州与南宋政治中心临安是一个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空间关系,山东济南与北宋政治中心汴京的政治地理位置恰好也不即不离。

①[宋]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20页。

②[宋]辛弃疾著,邓广铭、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2页。

③[宋]祝穆:《方輿胜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22页。

除了政治地理位置的相似性,信州在自然景观地理方面与山东济南有着更多相似性。泉城济南坐拥七十二名泉,众泉汇流而成大明湖,“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于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红绿如绣,令人渺然有吴儿洲渚之想。”^①家家泉水的故乡印记早已流淌在词人血脉里,沉淀成一种浓郁的湖泉情结。辛弃疾先后退居于信州的上饶和铅山,两地相去不过百里,依山傍水,自然风光十分优美。从辛弃疾《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谒金门·和廓之五月雪楼小集韵》《水调歌头·盟鸥》等词可知,上饶带湖与周边青山林木、绿野风烟融合成了一幅优美的自然图画。带湖居住期间,辛弃疾一直在四处寻访泉水,直到淳熙十二年(1185)“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②。辛弃疾访得周氏泉后欣喜万分,决定“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飞流万壑》),并把周氏泉改名瓢泉,此后他开始频繁往来于带湖、瓢泉之间。再后来,带湖房屋失火,辛弃疾搬至铅山,临瓢泉而居,《水龙吟·题瓢泉》《永遇乐·检校停云新种山松》《兰陵王·赋一丘一壑》等词流露出他对瓢泉超乎寻常的喜爱。在辛弃疾眼里,信州湖泉之美契合齐鲁游子内心深处的浓厚乡土情怀,其访泉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更是对精神故乡的不断追寻。

此外,强烈的情感诉求是辛弃疾信州选择的另一重要原因。淳熙六年(1179)、淳熙七年(1180)辛弃疾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任,朱熹在《乞拨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劄子》中对他赞许有加:“熹窃见荆湖南路安抚司飞虎军,原系帅臣辛弃疾创置,所费财力以钜万计,选募既精,器械亦备,经营葺理,用力至多。数年以来,盗贼不起,蛮徭帖息,一路赖以安。”^③淳熙八年(1181)台臣王蔺弹劾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④,朱熹眼里卓有成效的种种举措竟成为辛弃疾被台谏弹劾罢官的罪证,这给辛弃疾的信州选择奠定了英雄失意的情感基调。“功名浑是错,更莫思量着。见说小楼东,好山千万重”(《菩萨蛮·稼轩日向儿曹说》)、“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醉”(《霜天晓角·吴头楚尾》),信州词中多有此类失意落寞的情感表达。

在仕途失意壮志难酬的人生际遇下,词人通过“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人生孰若安居之乐”的表达,流露出内心对“邻”的强烈情感诉求。与信州之邻的互动交流,一方面疗愈疏通了辛弃疾的苦闷心情,另一方面也刺激了辛弃疾的创作欲,四百余首信州词极大丰富了南宋文学的地域化书写。

信州之邻首先是和辛弃疾一样南渡后意欲有所作为的北方士人,最值得一提的是韩元吉。韩元吉长辛弃疾22岁,字无咎,号南涧,河南颍州人,韩氏家族随宋室南迁而避地江南。韩元吉“虽袭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⑤,在信州幕府供职四年,淳熙七年(1180)致仕后定居信州。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也来信州定居,二人信州为邻前后计六年,来往十分密切。辛弃疾仅为韩元吉祝寿词就有五首之多,稼轩词“带湖之什”中尚有与韩元吉唱和词五首,这些词有的表达了对韩元吉的敬意和祝福,有的记录了二人的信州游赏之乐。信州唱和对罢官的辛弃疾和归老的韩元吉来说都是难得的精神慰藉。

辛弃疾与韩元吉交往密切的原因大致有四:其一,韩元吉主张北伐抗战,但并不感情用事。宋孝宗在绍兴年间任用张浚北伐,韩元吉曾上书张浚曰:“夫战则当有其备,和则当有其谋,守则当有其地,非可依然妄动以侥幸于万一也。战既无备,而和既无谋矣,则所守果何地哉?”^⑥足见其对北伐审慎理性的态度,与辛弃疾的北伐态度完全契合。其二,韩元吉是当时信州的文艺界领袖,撰有《南涧甲乙稿》七十卷,“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之下,而湮没不传,殆不可解”^⑦。对才情奇高的辛弃疾而言,以文会友是非常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韩元吉的文名之盛对辛弃疾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其三,韩元吉和辛弃疾同为北人南下,所不同者韩氏是南渡时举家南迁,辛氏是南渡后南下归宋,北方故土陷于敌手是他们共同的人生困境。朱熹曾评价韩元吉诗歌“无咎诗做得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嘶之音”^⑧。辛弃疾“落日楼

①[金]元好问著,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3页。

②[宋]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43册,第385页。

④[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册,第12164页。

⑤[宋]叶绍翁著,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8页。

⑥[宋]韩元吉:《上张浚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76册,第321页。

⑦[清]永瑢、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下册,第2146页。

⑧[宋]朱熹著,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册,第3316页。

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慷慨悲歌与韩元吉诗中的“中原之旧”如出一辙,身份和情感认同是他们交往能够深入的重要条件。其四,韩元吉致仕定居信州前曾官至吏部尚书,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在重事功的齐鲁文化熏染中长大的辛弃疾,对韩元吉的仕宦成就会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在酬赠词中辛弃疾多次称久离政坛的韩元吉为“韩南涧尚书”,体现出他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

辛韩二人频繁互动的文学意义在于:两人在气节志向上彼此认同,并以诗词唱和的形式彼此激励,这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稼轩词里的那份英雄之气,使得词人虽罢居信州却并没有沉溺于远世偏居的闲适情调,也没有陷入渺无希望的沉沦绝望中。以淳熙十一年(1184)所作《水龙吟·甲辰岁寿南涧尚书》为例: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林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本是为韩元吉贺寿之词却无一句喜庆语,追念国家巨变之痛,胸怀北伐恢复之事,竟然满纸慷慨之气和英雄之志!辛韩二人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深情厚谊,在该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曾应上饶广教僧舍之邀作《两贤堂记》。两贤指吕本中和曾几:吕本中祖籍莱州,定居寿州,官至中书舍人;曾几江西赣州人,定居河南府,官至敷文阁待制。韩元吉将吕本中和曾几视为和自己一样的“北来之渡江者”。在政治立场上,吕本中和曾几均坚决主战,不满于秦桧的议和主张,于绍兴间先后被罢官退居信州上饶,“盖退而老于稽山之下,而上饶之人称一时衣冠。师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则拳拳不忍忘”^①,言语中透露出能与二公为邻的自豪。

对江西上饶而言,淳熙六年是一个值得特别提及的年份,这一年,辛弃疾上饶新居落成,吕本中、曾几、韩元吉和辛弃疾在同一个时空点相遇。“广信为江闽二浙往来之交,异时中原士大夫南徙,多侨居焉”^②,这种历史性相遇对辛弃疾的信州书写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据钱建状先生统计,北方著名文人南渡寓居信州一地的至少有韩元吉、吕本中、曾几等六家,而定居于两湖的总不过八家。“从居住方式来看,陈与义等在两湖多为留居,而吕本中、韩元吉等多是定居于此,他们的子孙往往也在此繁衍”^③,钱先生所言定居信州的六家北方文人也包括辛弃疾在内。这些同样北人南渡的邻居们,这些同样意欲有所作为而时不我与的士大夫们,在精神上慰藉着辛弃疾的苦闷和落寞,让退居信州的文人并不孤单,让本可能消沉寥落的信州词坛依然不乏慷慨英雄气。

二、江西文风日盛:融入信州地域文化

从地域文化角度对稼轩词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比较多,但令人遗憾的是,此类文章多用涵盖地域范围极广阔的“江南文化”(或南方文化)概念替代地域范围较狭小的“江西文化”概念,进而再把“江南文化”这一宏阔的地域文化概念与“齐鲁文化”这一相对狭小的地域文化概念进行对比分析。傅承洲《稼轩词风与南北文化》^④、陈玉兰《辛弃疾词: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叠合形成的艺术世界》^⑤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也不乏宏观而独到的见解,惜于所用地域文化概念过于宏阔而略显笼统。很显然,这会造成地域文化概念在内涵外延上的不对等,进而影响对比分析的效果和结论。“相对于北方五路而言,宋代南方文化的次地域性特征比较明显,尤其是江西、四川、福建、两浙等地,其地域文化性格颇不相同,塑造出的家族与文学品格也有很多差别”^⑥,因此,以江西文化概念替代江南文化概念来对稼轩词进行地域性文化解读就变得很有必要。

①[宋]韩元吉:《两贤堂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6册,第186页。

②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2页。

③钱建状:《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④傅承洲:《稼轩词风与南北文化》,《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⑤陈玉兰:《辛弃疾词: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叠合形成的艺术世界》,《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

⑥张剑、吕肖奭、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江南东西路，盖《禹贡》扬州之域，当牵牛须女之分，东限七闽，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①，江西人文之盛是在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中日渐涵养而成的。谭正璧《中国文学家辞典》辑录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共计25人，宋金时期共计156人，可以想见两宋江西文学的繁盛局面。北宋时期，江西文人异军突起，临川晏殊父子和王安石兄弟、清江孔文仲兄弟、庐陵欧阳修、南丰曾巩家族、洪州修水黄庭坚、南昌洪朋兄弟等，均以各具特色的创作实践引领着北宋文坛，其中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黄庭坚引领的江西诗派的出现更是里程碑式的文学现象。即使宋室南渡，江南路备受战争蹂躏，江西人文之盛依然有突出表现，吉州庐陵胡铨、吉州杨万里、吉州刘过、临江向子諲、饶州姜夔等著名文人光耀了南宋文坛，这一切构成了辛弃疾选择信州居住的特定文化背景。

辛弃疾所处的南宋党争十分激烈，江西诗派偏重艺术的创作方式更适合文人士大夫在险恶政治环境中的生存，所以地域性文化特征突出的江西诗派在南宋文坛影响力十分显著，杨万里、尤袤、陆游、范成大等“中兴四大家”早年都曾取法于江西诗派。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特点，和稼轩词善用典故善于化用前人诗句入词的行文风格，这两个本自独立的文学现象因为辛弃疾寓居信州而有了某种程度的关联。据熊笃《论稼轩词的用典》^②、陈学祖《典故内涵之重新省视与稼轩词用典之量化分析》^③以及张宇《稼轩词用典研究》^④等研究成果，《稼轩词编年笺注》629首词中用典数量达2184处，出入经史子集，尤以集部为多，占比达到56%强。通过对稼轩词用典出处进行定量分析可知，黄庭坚诗词以23次的频率居稼轩典故来源的第19位，可见辛弃疾对江西诗派在创作观念上的认可和在创作实践上的呼应。

具体到信州一地，虽“土瘠民贫”却也同样“文风日盛”^⑤。显然，除却受韩元吉等寓居信州的北方士大夫吸引外，信州“文风日盛”的本土文化特点也是吸引辛弃疾退居于此的一个重要因素。辛弃疾信州居住期间，交游甚广，信州酬唱词占比超过全部酬唱词的75%，这一现象既反映了辛弃疾与韩元吉等北方文人交游唱和的情况，也记录着他与信州本土文人往来赠答的盛况，兹录一二如下：

赵晋臣，史料极少，生卒年不详，信州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曾任中奉大夫，直敷文阁学士。辛词中酬赠赵晋臣的词多达22首，为文人酬赠词之冠，可见二人交游之欢、过往之频。

赵蕃，字昌父，信州人，南宋中期著名诗人、理学家。辛弃疾写给赵蕃八首酬赠词。从赵蕃《以归来后与斯远倡酬诗卷寄辛卿》“狂余更欲谁送似，咫尺知音稼轩是”的诗句可以看出，二人交情颇深、互为知音。

傅为栋，字岩叟，信州人。辛弃疾经常到访傅宅，对宅中悠然阁非常喜欢，在与傅岩叟的十三首酬唱词中有五首为悠然阁而作。另有《送剑与傅岩叟》诗，诗意与《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词意相近，可知辛傅二人交游所触及的思想深度。

在江西文风日盛的文化背景下，辛弃疾与江西本土人文环境之间有了越来越频繁的互动交流，进而与信州本土文人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游往来，这一方面释放出外籍文人辛弃疾已日渐融入江西本土文化的信号，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生动丰富的文学图景。

三、信州词坛唱和：推动地域文化交流

两宋时期信州属江南路，北隔饶州与鄱阳湖相邻，东接两浙路，南邻福建路，西毗隆兴府，乃南宋中心腹地，是都城临安与西南地区及福建路诸州县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自东向西流经的信江又为临安与西南各州县的联系提供了便捷的水上交通条件。因交通便利，信州具有了进可直达政治中心退可安于山水林泉的政治地理优势，再加上远离宋金对峙的淮河前线，稳定的社会发展又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根本保

①[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册，第2192页。

②熊笃：《论稼轩词的用典》，《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③陈学祖：《典故内涵之重新省视与稼轩词用典之量化分析》，《柳州师专学报》2009年第9期。

④张宇：《稼轩词用典研究》，硕士论文，吉林大学中文系，2012年。

⑤[宋]祝穆：《方輿胜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上册，第317页。

障。由此可见,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是定居信州的北方文人远多于两湖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文化精英的汇居之地,信州被刘克庄称为“过江文献所聚”之地,辛弃疾的到来更是为信州的地域文化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其表现就是信州词坛开始热闹起来。

淳熙九年(1182),即辛弃疾罢归信州上饶的第二年,浙江年轻文士范开来上饶问学于辛弃疾,足见词人盛名早已传播文坛。在受辛氏教诲六年后,范开为稼轩词集作序:“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①对辛弃疾的词坛盛誉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深刻认同,在彰显稼轩体独具特色的同时,更加凸显了辛弃疾独领风骚的词坛地位和文化价值。

同样是淳熙九年,辛弃疾以《水调歌头·盟鸥》一词拉开了信州词坛唱和的序幕。虽然信州唱和现场早已消逝,唱和者的原作也难觅踪影,所幸稼轩词中还留存了两首同词调的和谢词,稍稍弥补了今人遗憾。其中一首和谢词的题序为“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另一首题序为“严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韵,因再和谢之”,略加统计可知,辛弃疾一首词至少催生了七首往来唱和词,堪称信州词坛唱和的一个小高潮。

汤朝美,名邦彦,“自负功名,议论英发”^②,此次唱和发生时正在信州居住;严子文,名焕,江苏常熟人,《江南通志》赞其“文章整健,诗学尤邃”,此时在泉州任上;傅安道,泉州人,“喜吏事,工文章,而性复高简”^③,此时闲居泉州。考察三位唱和者的居住地可知,辛弃疾与汤朝美均在信州居住,属同时空唱和;与严焕、傅安道的唱和则突破了信州范畴,属异地唱和,是江南路和福建路之间的地域文化交流。初居信州的辛弃疾以词为媒介,在与信州文人建立情感和文化链接的同时,也与信州周边文人建立了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进而推动了信州词坛的发展繁盛。“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从这些唱和 content 不难看出,这一场词坛唱和是以仕宦失意、英雄不遇的人生感喟为基调,表现出了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情感特征和同气相求的精神境界。

还是淳熙九年,信州迎来了第二次词坛唱和。唱和者共计四人,辛弃疾和杨济翁、范南伯、丘密。杨济翁《蝶恋花·稼轩坐间作,首句用丘八书中语》《蝶恋花·别范南伯》为原唱,辛弃疾《蝶恋花·和杨济翁韵,首句用丘宗卿书中语》《蝶恋花·继杨济翁韵饯范南伯知县归京口》为和作。两首词都在伤春惜别,均以“点检笙歌多酿酒”起句,表达出在煦暖春日中及时行乐的态度和春去恼人的感伤情绪;两首词送别的是同一人——范南伯,都表达出强烈的不舍和感伤。此外,辛弃疾还有一首同调词“小小年华才月半”,是赠给杨济翁的侍儿的,可知这次词坛唱和还有歌儿舞女佐酒助兴。杨济翁,即杨炎正,江西庐陵人,小辛弃疾5岁,登庆元二年(1196)进士第,也是辛弃疾的追随者。辛弃疾罢归信州,杨济翁也追随至信州。这次词人雅集现场感很强,辛弃疾和追随者的唱和再一次照亮了信州词坛。

辛弃疾信州词坛唱和的高潮发生在淳熙十五年(1188),这一年词人五十岁。为了探讨北伐恢复等国家大计,辛弃疾与陈亮、朱熹有鹅湖之约,陈亮自信州东北方向的婺州、朱熹从信州东南方向的建阳同赴信州鹅湖之会。信州在地理交通上连接临安和福建,这一交通枢纽地位是鹅湖之约的重要地理条件。朱熹因故未能赴约,鹅湖之会仅限辛弃疾和陈亮两人。因此,这一次信州词坛唱和的主角由三人变成了两人。随着南宋偏安江南这一段历史的结束,辛弃疾与陈亮“长歌相答,极论时事”^④的谈话内容变得似乎不那么重要了,被文学史家视为美谈的“鹅湖之会”最终落脚在一首首唱和词上。陈亮,字同甫,婺州人,喜欢议论时政,反对屈膝投降,提倡实事实功,即使因上书言事得罪权臣而被构陷下狱,依然不改初衷,与辛弃疾英雄相惜。辛陈二人相似的性格襟怀决定了这次词坛唱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特点。

围绕鹅湖之会,辛弃疾和陈亮往来唱和词共计六首,五首用“贺新郎”词调,一首用“破阵子”词调,“父老长安今馀几,后死无仇可雪”“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声声掷地有声的豪放愤懑之语,或指点江山,或品评时政,或歌唱友情,或叹息命运,二人站在忧国忧民的制高点同声相和,视野之开阔、情感之顿挫、风格之豪壮堪称信州词坛唱和的最强音!

①[宋]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20页。

②[宋]刘宰著,王勇、李金坤校证:《京口耆旧传》,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2页。

③[宋]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30页。

④[宋]辛弃疾著,邓广铭、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因此,刘扬忠先生才把鹅湖之会作为衡量稼轩词派存在与否的一个力证,“辛、陈‘鹅湖之会’及此后的以词唱和行为,不但是南宋政坛上优秀政治家互觅知音的一段佳话,也是词坛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一次文学结派活动”^①。

在与泉州、婺州等周边地区的文人雅士、爱国志士诗词唱和的同时,辛弃疾更加频繁地与信州本土文人志士们以词唱和。如前所言,韩元吉、赵晋臣、赵蕃、傅岩叟等人,或寓居于信州,或生长于信州,其中不乏并不擅长依声填词者,但因同气相求人品可称道,辛弃疾与这些信州本土文人酬唱的词作数量最为可观,这极大地发挥了词的社交功能,活跃了信州词坛。有学者统计“《全宋词》辑录词人共1397位,其中江西籍词人就有174人,占总人数的12.64%,排位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②,在全国第二的词坛排名里,像辛弃疾一样的北方词人对江西词坛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值得一提的。除了信州本土的文人志士们,辛弃疾以词为媒介的交往还涉及到信州地方官员,如信州玉山县县令陆翼年,辛弃疾作《六么令》两首为之送行;信州知守郑汝谐,辛词中有不少与之唱和之作;铅山县宰吴子似,稼轩词中与之唱和的词作多达十余首。

不难见出,词中巨龙辛弃疾的到来使信州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文学磁场”。辛弃疾站在磁场的正中心,以自身独具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吸引着定居信州的文人志士们。与此同时,凭借着信州四通八达的地理交通优势,这种影响力还会波及到周边的泉州、婺州以及整个豫章文人圈,信州地方官员的升迁流动又会把信州唱和的能量传播到更远的文人圈去,由此形成了以信州为圆心的地域文化交流的动态景观。词这一文体充当了这一景观的重要传播媒介,其社交功能、实用功能被辛弃疾发挥到了极致。

四、稼轩词风:融南北文化于一炉

《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③,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影响人性格的因素里“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④,东西方文化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一直在不断深入。文学即人学,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生长于齐鲁久居于信州的辛弃疾一直在努力寻找两地之间的相似性,以弥补他远离故土终老异乡的人生憾恨。“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⑤,其实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地理环境,齐鲁和信州两地之间都有着天然的地理空间差异。浸润在南北不同地理空间里的稼轩词,不知不觉中就有了两个各具特色的地域印痕,这绝非两个边缘清晰的烙印,齐鲁和信州的山水自然人文习俗等特点必然会在辛弃疾身上发生碰撞和融合,最终呈现为一个新的独特的融合性地理空间,进而影响到词人的生活、交游、创作等多个面向,词风多样性就是这一融合性地理空间在稼轩词中的突出表现。

“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⑥,这是清人况周颐对于南北地理空间影响词风形成的典型表述。铁马秋风和杏花春雨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空间合力影响着辛弃疾,使得稼轩词融南北词风于一炉有了极大可能性。“有花柳而无松柏,有山水而无边塞,有笙笛而无钟鼓,斤斤株守,是亦只得其一偏矣。辛刘之派,安可废哉!”^⑦“稼轩词,豪放师东坡,然不尽豪放也。其集中,有沉郁顿挫之作,有缠绵悱恻之

①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0页。

②夏汉宁:《试论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贡献及其地域分布特征》,《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上册,第1338页。

④[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11页。

⑤[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册,第1730页。

⑥[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册,第4456页。

⑦[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第3561页。

作，殆皆有为而发。其修辞亦种种不同，焉得概以‘豪放’二字目之。”^①恰如词评家所共识，稼轩词风格多样性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亦刚亦柔亦豪亦婉，其含义有二：其一是指稼轩词中既有刚性豪放的词作，又有柔性婉媚的作品；其二是指稼轩词中刚豪柔婉两种风格并非截然对立，更多的情况是一首词融合了两个向度的不同风格特色，体现出刚柔并济亦豪亦婉的整体风格，这一整体风格在信州词中表现尤突出：信州闲居使得北方文化记忆和信州柔山软水朝夕相会，从而使得信州词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融合南北词风刚柔相济的整体风格特点，《贺新郎·绿树听鹈鴂》《沁园春·一水西来》《沁园春·叠嶂西驰》等词笔法腾挪迅速，短章之内变化开阖，健笔与柔情相互熔铸，是刚柔相济风格的经典代表。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是辛弃疾式的表达，是创作主体把自己的豪情和胸襟投射到外物上，用虚笔描绘的方式让自然景物呈现出创作主体的精神风貌和人格特质。南方的山水和来自北方的词人就用这种特殊的审美方式欣赏着融合着，无怪乎稼轩词中的信州山水柔婉中别具一种北方气质。

总之，以信州退居地选择为切入点，还原辛弃疾以词唱和交游的生动历史现场，稼轩词的词风多样性就有了基于地理空间转移的空间文化意蕴，它既是宋室南渡背景下北人南渡这一特殊人生经历的生动写照，也是特定时空下南北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诗意书写。稼轩词风的多样性传递出南宋词在时代巨变、文化冲突中发生新变的讯息，也印证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民风民俗、精神性格、文艺创作影响深远的人地关系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创作个体在文艺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示范了一个良好方向：凭借自身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以开放的态度和胸襟，站在文化交流的磁场中心，做一个吸引者、推动者和传播者，让地域文化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并且深化。因此，稼轩词风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词史意义和地域文化价值。

Xinzhou Ci-Poetry of Xin Qiji: a Poetic Express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ZHU Chang-y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land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in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research on Song Ci-poetry is no exception.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Chunxi er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iaozong of the Song Dynasty, Xin Qiji was impeached and removed from office, retreating to Xinzhou in Jiangxi for as long as two decades. This choice of retreat was not only a life decision but also a cultural one. Beginning with his search for a spiritual homeland, Xin Qiji chose to settle in Xinzhou. After integrating into the local cultural circle of Xinzhou, he used Ci-poetry as a medium, radiating outward from Xinzhou as the center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Quanzhou, Wuzhou, and the entire Yuzhang literary circle. This formed a dynamic landscape of regional cultural exchange, which in turn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the diverse style of Jiaxuan Ci, blending the vigor of the north and the elegance of the south. By taking the choice of retreating to Xinzhou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cene of poetic exchang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diversity of Xin Qiji's Ci-poetry style gains a region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rooted in the shift of geographical space. It serves as a poetic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n a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Keywords: human-land relationship; Xin Qiji; Xinzhou Ci-poetry; regional cultural exchange; poetic expression

[责任编辑 唐音]

^①[清]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第4913页。